



# 《古文苑》论稿

王晓鹃 著

西安工业大学语言文学研究丛书

# 《古文苑》论稿

王晓鹃 著

责任编辑:李椒元

装帧设计:曹 春

责任校对:夏明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古文苑》论稿/王晓鹏著. 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0.9  
ISBN 978-7-01-009043-6

I. ①古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古典文学-文学研究  
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4313 号

## 《古文苑》论稿

GUWENYUAN LUNGAO

王晓鹏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0.875

字数:242 千字 印数:0,001-3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09043-6 定价:27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西安工业大学专著出版基金资助

# 序

伏俊琰

《古文苑》作为一部总集,具有全集和选集的性质。所谓全集,就是“网罗放佚,使零章残什,并有所归”;所谓选集,就是“删汰繁芜,使莠稗咸除,菁华毕出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)。就第一层意义说,《古文苑》是一部辑佚学著作;就第二层意义说,则是一部文学作品选集。这部书一共收录有 264 篇唐以前的诗文,这些文章不见于《昭明文选》和有关史传,只有一部分见于唐人类书。所以,他是研究唐前文学的极其珍贵的资料。后人辑佚唐前文学作品,这部书是丰富的宝藏。明人张溥编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、清严可均编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、现代学者逯钦立编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,都从这部书中搜取了诸多作品。但是《古文苑》的来路不清,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献价值。

王晓鹃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《古文苑研究》,就是试图解决《古文苑》的来历和身世的。答辩时诸位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,并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。经过两年的断续修改后,就是呈现给学界的这部《古文苑论稿》。作为王晓鹃同志的指导教师,这部书的初稿和修改稿我都认真读过,我觉得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,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创新之处。

第一、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对《古文苑》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新说。比如《古文苑》的编者,这是一个近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。最早把《古文苑》编成九卷的南宋人韩元吉在宋孝宗淳熙六年(1179)写的整理记中说:“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,莫知谁氏录也。皆史传所不载,《文选》所未取,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,好事者因以《古文苑》目之。”从此以后,说起《古文苑》,大致都是沿袭韩元吉的说法。当然,也有学者间或提出过不同意见,如清人顾广圻《与孙渊如观察论九卷本〈古文苑〉书》就认为是宋人所编,郭沫若先生《石鼓文研究》则说是章樵所编。顾氏提出了问题,论证尚嫌不足。郭老的说法只是一种随意之说,更不足为训;因为章樵重编此书(1232年)前半个多世纪(1179年),韩元吉已明确记载刻印此书了。《古文苑论稿》则通过详尽的考证,得出《古文苑》成书时间大致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(1151)至绍兴三十一年(1161)之间,其编者可能是著名金石学家王厚之;他是在北宋孙洙《杂文章》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。这一说法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,可成一家之说。

再比如,关于《古文苑》收录文章的来源,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认为是从类书中采录而来,顾广圻认为此说“洵精确不易之论也”,所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采用其说。本书对《古文苑》收录的264篇文章逐一进行排查,发现见于唐宋类书者凡163篇,见于宋前及宋代其他文献者52篇,仅见于《古文苑》者49篇。而见于类书者,只有64篇与现存类书相同,其余则字数多于类书,或字数少于类书。所以,本书认为,《古文苑》的编者应当是广泛地从当时流传的文集中搜集唐前文章,类书仅为其部分文章的来源。

再比如,关于章樵《古文苑注》的价值,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说“《古文苑》章樵注聊胜于无而已”,由于钱先生崇高的学

术地位,他的说法影响很大,很多人因此就认为章注可取者不多。《古文苑论稿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,对章樵注所做的工作做了系统梳理,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章樵校注时增加诗文 32 篇,不仅基本补全九卷本所录的一部分单篇诗文,而且进一步保存了汉魏佚文,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二是章樵调整篇目次序,修改篇名,补勘文字,注音释义,注释典章制度名物地理,对我们整体理解作品无疑有积极意义。三是章樵在作者下设置小传,于篇目下设置题解的校注法也值得肯定。当然,其校注也有不足之处,如录文有遗讹现象,对一些作者也疏于考辨等。前修未密,后出转精,正因为有章樵的注,才有了《古文苑》在南宋后期的广泛流传,才有了清人顾广圻、钱熙祚等人更为精当的校勘。

此外,本书在《古文苑》的版本流传、《古文苑》收录作家作品的分类及其别集的流传、《古文苑》收录文章的标准、《杂文章》与《古文苑》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,提出了一些新看法。这些新的观点,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了《古文苑》的研究。

第二,对传统的考据学方法比较灵活的运用,是《古文苑论稿》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。比如本书考证《古文苑》的成书时代,先从书中收录文章的来源入手。考证《木兰诗》录自《乐府诗集》,又进而考证郭茂倩的生平,以确定《乐府诗集》成书于 1056—1063 年(宋仁宗嘉祐元年至八年);考证《石鼓文》的录文源自北宋时石鼓第六鼓被截断之后;考证《诅楚文》当录自宋室南渡原拓散落以后,等等。据此,《古文苑》成书于唐代就是根本不可能的。然后再考察相关文献,发现唐代以至北宋人的文献资料中没有《古文苑》的任何记载;既然世传《古文苑》是孙巨源得之于佛寺,又对孙氏的生平、交游、著术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排查,没有发现

任何一点和《古文苑》有关的蛛丝马迹；而最早记载《古文苑》的是南宋郑樵的《通志》（成书于公元 1161 年），此后，《容斋续笔》（成书于公元 1192 年）、《遂初堂书目》（成书于公元 1194 年前）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（成书于公元 1245 年）、《读书附志》（刻于公元 1250 年）皆著录。南宋中晚期，学者引用《古文苑》已很普遍。而南宋最有权威的目录《郡斋读书志》（成书于公元 1151 年）却没有著录《古文苑》。通过勾稽了晁公武的家世、仕宦经历、学术积累和学术成就，认为晁氏不是有意忽略或不著录《古文苑》，而在其撰写《郡斋读书志》时，《古文苑》并不存在。通过对《郡斋读书志》所收书目和作者进行的统计和考索，又佐证了这一怀疑。最后作者把《古文苑》的成书锁定在公元 1151—1161 年之间（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）。

那么这十年当中，谁是编辑《古文苑》的最可能的人呢？作者通过对《古文苑》编辑体例的分析，认为全书以刻石文冠于首卷，其中包含了编者的信息，即编此书者可能是一位金石学家。然后按此思路顺藤摸瓜，在当时较多的金石学家中，发现有郑樵、薛尚功、施宿、王厚之四位最符合编辑条件，最后又逐一进行排除，从对《古文苑》收录的石刻文之看法的差异、录文的异同等最后确定编者应当是王厚之。并对孙巨源编辑的《杂文章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，认为《杂文章》57 篇辞赋是《古文苑》收录 58 篇辞赋的基础，并因此而增补成 233 篇的《古文苑》九卷本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王厚之才托名北宋名臣孙巨源，借以自重其作。

当然说《古文苑》是王厚之所编，早在清范邦甸《天一阁书目》中就有说明，而且范氏还具体说是南宋绍兴己卯（1159）王厚之编的。但范氏只说一句，其根据可能是王厚之所讲自己收藏《石鼓文》拓本的经过：“绍兴己卯岁，予得此本于上庠，喜而不寐，手自

装治成帙。”再没有进行论证。在学术史上,前人只提出了猜想,而由后人进行证实者,屡见不鲜。如清人邹汉勋在古韵界提出“娘日二纽归泥”,后来章太炎先生进行了详细论证,证成了此说;钱玄同提出“邪母古读定”,我的老师郭晋稀先生通过大量的三代韵文、古读、谐声、异文等材料,论证《说文》中所有的邪母字上古都读定母。所以《天一阁书目》只提了一句,而由王晓鹃同志进行详细论证,符合学术史上步步推进的成规。

充分利用表格形式,用精确的统计数目,使论述的问题一目了然,是《古文苑论稿》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特点。全书用20多个列表说明要讨论的问题。比如《〈郡斋读书志〉所载作者不明作品统计表》从《郡斋读书志》收录的近1500种图书中检索出225种作者不明或明显系伪托的书籍,以说明晁公武著录书籍以求实为基本标准,只要是当时流行的书籍(大部分是他亲眼所见),都要加以著录。以《古文苑》这样份量的书,如果当时已经存在,晁氏是不可能看不到的;如果晁氏看到,是绝不会不著录的。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当时还没有《古文苑》这部书。再如《隋代至元初官私目录书著录〈古文苑〉所载作者别集及其卷数变化情况一览表》对《古文苑》中57家的别集在《隋志》到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七部目录书中著录(或没有著录)情况进行列表,以说明从唐到元初这57个作家别集的散佚及重辑情况,而《古文苑》在这个由佚到重辑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。其他如《〈古文苑〉与唐前史传、〈文选〉收录赋作情况对比表》、《〈古文苑〉录载辞赋来源简表》、《〈古文苑〉录载诗歌来源简表》、《〈古文苑〉录载散文来源简表》等都让读者对所论述的问题一目了然。作者为这些列表所付出的艰辛劳动,我们是要感谢的。而这些谱牒图表中所体现的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思想,读其书者自可体会。

谱牒之学,图表之志,本来是中国学术的源头之一。太史公曰:“余读谍记,黄帝以来皆有年数”(《史记·三代世表序》),其来尚矣。《史记》有十表,“虽燕越万里,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;虽昭穆九代,而方尺之内雁行有序。使读者阅文便睹,举目可详,此其为快也!”(《史通·杂说》)《古文苑论稿》正是继承的传统的学术方法,并和现代统计学的方法结合起来。我以为,治学方法的创新并不是使用一些新名词、新概论,科学研究的方法,说到底,就是普遍联系的看问题、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。古代文史研究的根本方法,就是如何拨开历史的沉沙,尽可能多地再现历史之本来面目,也就是《汉书·河间献王传》所说的“实事求是”。《古文苑论稿》在运用考据学方法上做了比较成功的尝试,因此也就成为本书的亮点之一。

当然,这毕竟是王晓鹏同志步入学术界的第一部著作,所以有些观点还值得商讨,有些材料还需要更细致的解读,论证过程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条理化。比如作者考定《古文苑》成书在在公元1151—1161年之间(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),其实王厚之收藏《石鼓文》拓本是在绍兴己卯岁(1159)(章樵注《古文苑·石鼓文》后附录),如果《古文苑》确实是由王厚之编辑而成,则成书时间应当是1159年到1161三年内。我前文说王晓鹏同志考证《古文苑》是由王厚之编成的,这仅是一家之言,因为作者的考证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。但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并不能说明已是历史真实。因为郑樵的《通志》已著录有《古文苑》,而根据《宋史》卷436《郑樵传》的记载,郑樵是由侍讲王纶的推荐而得以谒见皇上的。根据《郑樵传》的文意,郑樵和高宗见面召对时似乎《通志》已经写成,所以皇上特“给札归抄所著《通志》”。而王纶推荐郑樵的时间是绍兴二十六年(1156)(《宋史》卷372)。即使王厚

之1159年编成《古文苑》，郑樵未必会立即在他的大著中著录此书。因为根据韩元吉的说法，他之前似乎还没有《古文苑》的刻本。刚编成的书，仅有抄本，其流传不广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且《通志·艺文略》主要是根据现成在目录书纂集而成。所以我说王厚之编成《古文苑》不是定论。我提出疑问，可能使这个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。

再比如，本书对清人《古文苑》中收录文章主要源于类书的说法提出质疑，并为此详加考证，引征繁富。但所据仅为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这四部，这就要打折扣了。因为唐代类书之多，是远远超过现在人想象的。新旧《唐志》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遂初堂书目》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著录的唐代类书不下于80种，而敦煌石室出土的类书（主要是民间类书），也不下于数十种（见台湾王三庆《敦煌类书》）。当然，这些类书，大量的都散佚不存，但编《古文苑》的时候，保存的应当是相当多的。

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，韩元吉说《古文苑》是从佛寺经龕中所得，恐怕也不是向壁虚造。唐代的佛寺中存有大量图书，不仅有大量释典，而且有大量世俗文书。当时佛寺中藏书可能最为安全。比如著名诗人白居易，在他73岁时（会昌五年，公元845年）把自己的文集订补为75卷，并分抄五部，“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，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院，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，一本付侄龟郎，一本付外孙谈阁童”（白居易《白氏长庆集后序》）。白居易非常在乎自己的诗文集的珍藏和流传，他地位很高，抄了五部，三部就放在佛寺，“藏之寺院，不借外人”（白居易《东林寺白氏文集记》）。唐代僧人擅长写诗者不少，他们大多是在佛寺中读的世俗诗文集。比如晚唐诗僧齐己，从他的《白莲集》

中可能看出他阅读了不少当时的诗人别集。日本的遣唐使在中国佛寺中得到了大量的世俗文书。《大正藏》第55册收录了日本僧人入唐求法的目录,如圆仁撰于承和十四年(唐大中元年,公元847)的《兹觉大师在唐送进录》、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》,圆珍撰于大中八年(854)九月的《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》等,都著录了大量的世俗诗文集。后来日本佛寺中存有大量古籍,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,搜辑得到了多种古书,光绪年间由杨守敬编成《古逸丛书》出版,其中一部分就得之于日本的佛寺古刹。而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的五万馀卷古代文书中,四部书及世俗文书占有相当比重,更说明古籍得之于佛寺经龕完全有可能。

王晓鹃同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曾专门学过教育学、心理学等专业,后来学习古典文献学。她认真踏实,刻苦努力。攻读博士学位以来,一直是午夜篝灯,残宵不倦。所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,就对《古文苑》做了这样深入的探掘,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但是学海无涯,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,需要我们不断探索。中国的学术典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结晶,它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力,他是广袤无边的沧海,能在这大海中搏击风浪,认识和领略他的伟大和雄浑,是人生很大的乐趣。这里,我把已故潘重规先生抄给我《瀛涯敦煌韵辑新书序》中的一段话略作改动,作为这篇序的结束,也和王晓鹃同志共勉:

我们根据正确的新材料,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学说;如果根据不正确的新材料,推论出来的新学说,自然也不正确了。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,才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学说,才能产生正确的新学说。我们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,目的便是在继续前辈学者的努力,找到正确的新材料,作为发明新学说的可靠根据。所

以每一个人的学术成果,都应该乐于接受不断的指正和修订,使我们获得的新材料越来越丰富,越来越正确。我们不分先后,不分彼此,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。

2010年1月8日子夜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《古文苑》成书情况 .....   | 1   |
| 第一节 成书年代考 .....       | 1   |
| 第二节 编者考 .....         | 40  |
| 第三节 《古文苑》与《杂文章》 ..... | 58  |
| 第二章 《古文苑》版本源流 .....   | 71  |
| 第一节 版本考 .....         | 71  |
| 第二节 章樵注本评析 .....      | 84  |
| 第三章 《古文苑》文体分类 .....   | 113 |
| 第一节 作家作品 .....        | 113 |
| 第二节 文体分类 .....        | 129 |
| 第四章 《古文苑》文献渊源 .....   | 158 |
| 第一节 收录标准 .....        | 158 |
| 第二节 辑录诗文来源 .....      | 17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章 《古文苑》与其他诗文选本 .....    | 241 |
| 第一节 《古文苑》与宋前及宋代诗文选本 ..... | 242 |
| 第二节 《古文苑》与《续古文苑》 .....    | 264 |
| 结 语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84 |
| 附录:《古文苑》历代叙录与题跋 .....     | 287 |
| 参考文献 .....                | 323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329 |

# 第一章 《古文苑》成书情况

## 第一节 成书年代考<sup>①</sup>

一般来说,一部文学选本的编纂,大都有发凡起例,序言跋文,以此来交代本书的编纂宗旨、体例结构、价值取向、成书时间、编者的生平事迹及文学主张等相关事宜。但是,《古文苑》却缺少这些重要元素。因此,关于此书的基本情况,历来没有定论。至于其成书时间,更是扑朔迷离。

从现存史料看,南宋郑樵编纂《通志》最先著录:“《古文苑》十卷。”<sup>②</sup>《通志》卷七十著录选本 72 部,凡 4862 卷,以时间编排,首为西晋挚虞编《文章流别集》,末为北宋末年无名氏编《宋文选》,《古文苑》列第 59 位,排在北宋李昉等编《文苑英华》、姚铉编《唐文粹》、苏易简等编《唐史文类》之下。这种编排体例实际上说明,在郑樵看来,《古文苑》的成书时间,应该是在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等著作之后,大致为北宋人所编,这是对《古文苑》成书时间怀疑之滥觞。

---

① 此文发表在《文史哲》2010 年第 1 期。有删节。

② 郑樵:《通志》,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,第 825 页。

南宋孝宗淳熙六年(1179),韩元吉校定《古文苑》为九卷,刊刻于任所婺州(今浙江金华),并撰写《古文苑记》一篇。韩元吉根据当时流传的说法,认为该书是北宋孙洙得于佛寺经龕,乃唐人旧藏古文章。这篇《古文苑记》,是关于本书成书时间最早的介绍。绍定五年(1232),章樵注释并重校《古文苑》为二十一卷时,承韩氏之说也认为:“《古文苑》者,唐人所编。”<sup>①</sup>此后,赵希弁和陈振孙也大体延续了韩氏旧说,遂使这种说法逐渐成为明清以来众多学者的习惯看法。然“世传”二字,实已表明南宋人对此书的成书时间已经不能肯定。

此后,明代都穆、清代顾广圻、钱熙祚和耿文光不仅对本书成书于唐代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明确质疑,而且初步推断出《古文苑》可能成书于宋代<sup>②</sup>。郭沫若从《石鼓文》和《诅楚文》入手研究,认为《古文苑》成书于南宋<sup>③</sup>。李芳在顾广圻论述的基础上,进一步将其成书时间大致划分在北宋嘉祐六年(1061)至南宋淳熙六年(1179)之间<sup>④</sup>。

以上研究可以肯定一个基本事实:由现存文献看,不仅唐人文献资料中没有关于《古文苑》的记载,就是北宋人的金石、传记、地志、类书、史料、目录等文献资料中,目前也没有见到关于《古文苑》一书的任何著录。我们整理了孙洙的生平,也没有发现他获

① 章樵校注,钱熙祚校勘,道光二十四年(1844)刊刻《守山阁丛书》本。本书所引《古文苑》篇目文字及相关序言跋文,均出自此本,后文不再一一注出。

② 参见都穆《金薤琳琅》卷二,顾广圻《与孙渊如观察论九卷本〈古文苑〉书》、钱熙祚《古文苑·校勘记》和耿文光《万卷精华楼藏书记》等文。

③ 郭沫若:《石鼓文研究·诅楚文考释》,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302页。

④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:《古典文献研究》(总第八辑),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,第260—270页。